

在上海书展触摸未来

■本报记者 卫中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大语言模型问世以来，表现出了让人啧啧称奇的文字表达能力，但由此引发了不少人对人工智能淘汰人类作家的恐慌。对此，复旦大学教授严锋认为这是“对创造力的倒逼”，让人更注重头脑风暴式的创新；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强调“思想性是科幻创作的灵魂”。也有学者指出，生成式大语言模型这类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类填充作品细节，充当“更高级的说书人”。

昨天，第三届读客科幻文学奖颁奖典礼及“ChatGPT会影响科幻创作吗？”主题对谈在上海书展举行。

文字仍是科幻文学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思想性是灵魂

好的科幻作品要有思想性，这是作品的灵魂。江晓原评价科幻文学的标准有两条：首先是要有思想性，要表达作者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思考；其次科幻作品要能给读者带来“奇观”，也就是让读者看到罕见的超乎寻常的想象力。他以第三届读客科幻文学奖铜奖作品《玉龙吟》为例，这部作品用古代文化的背景来建构故事，一方面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跟科幻题材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这种把古代文化、现代科技、未来想象结合在一起，带给读者新奇、愉悦的阅读体验，所以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奇观”。此外，在讨论到一些科幻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不足时，江晓原表示对文字质量差无法忍受，但对故事情节差相对可以忍受。他举例表示国外一些科幻作品的故事性其实也不能算很好，但不妨碍成为经典，例如《银翼

AI能否超越作家，成为“更高级说书人”

第三届读客科幻文学奖颁奖典礼在2023上海书展举行



▲电影《银翼杀手2049》剧照。
▶根据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改编的同名剧集剧照。
制图：冯晓瑜

杀手》《2001：太空漫游》《造星主》等等，《造星主》很多场景里没什么故事情节，就是主角在脑海里想”。

严锋则认为，语言文字仍然是科幻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对科幻作品的文学性可以从更多维的视角进行评价。例如经典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的作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文采，但他的文字“朴素、简洁、准

确有力，同时又是生动的，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还有不少人认为文字功底不是刘慈欣的强项，但他的小说《三体》里描述对王、周文王以及格利高利教皇等人物时“那种带着冷漠、残酷、暴力，同时还有一些黑色幽默的味道是很妙的”。既然说到了科幻文学的文字表现力，严锋也提到了他对ChatGPT这类生成式大语言模型

的看法：“ChatGPT的世界就是语言，但同时也将语言推到了极致甚至是危机的位置，可以说ChatGPT推动了21世纪新的语言学转型。”

在《科幻世界》副总编辑姚海军看来，科幻文学创作有很多不同分支，有的推演未来社会的形态，有的是展现科学的理性和美好，而这两种创作有很大的不同：“大家觉得科幻写的都是宏大

的东西，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和人类共情，如果没有对当下社会的洞察和思考，很难成为一部好的科幻作品。”

生成式大语言模型为文学润色，帮助“填充细节”

近期，美国等地陆续出现较大规模的编剧罢工，诱因之一就是抵制影

视公司使用大语言模型写剧本。那么这些大语言模型是否会取代人类作家或者编剧行业从业者呢？学者们的态度是：不必为此过度担忧。

第三届读客科幻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学者指出语言仍然是文学最基本的媒介，而ChatGPT这类生成式大语言模型更适合辅助人类作家更好地讲述故事，甚至当未来ChatGPT占有了人类全部资料库的情况下，有可能成为更高级的说书人。通过人们实践发现，生成式大语言模型在写作时更擅长“填充细节”。比如一个人类作者在描写一个房间时可能会有点干巴巴的，但是大语言模型会在哪里放了一张什么材料的桌子、一个什么形状的花瓶、一块什么颜色的手表等等。所以生成式大语言模型反而可以成为作家的辅助工具，帮助作家完善细节描写。实际上，此次第三届读客科幻文学奖征集作品过程中，没有特意甄别，也不会拒绝大语言模型参与写的作品。

对这种“人和机器结合”的文学创作模式，严锋表达了开放和积极的态度，他戏称自己已经“赛博格化了”，很多时候更多从人机结合的视角考虑问题。既然大语言模型擅长处理文学创作过程中的机械劳动，那人类作者更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更有创造性的工作上，进行头脑风暴：“这种创造力的倒逼，远远不止科幻写作或文学创作领域，甚至在学术教育等很多方面也适用，只是很多人还不适应这种变化。”

在上海书展邂逅文艺名家

茅盾文学奖获奖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在上海书展“圈粉”

孙甘露：真诚接受读者的检验

■本报记者 许畅

“来的路上非常忐忑，担心会不会只坐了两三排观众，没想到友谊会堂三楼满满当当。感谢这么多读者冒着酷暑和阵雨前来赴约。《千里江山图》真诚接受读者朋友们的检验。”昨天，迎来周末场的2023上海书展人气高涨，作家孙甘露直言“有点怵”“抓耳挠腮”。如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前不久摘得第11届茅盾文学奖后，首度面向公众的大型分享会。

“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在90年前、1933年的上海，我们有幸在当代上海生活、工作，本身就是一种馈赠。”生于斯长于斯，孙甘露诉说着对这座伟大城市的感恩与致敬，而《千里江山图》似长卷，如长信，描绘出一代理想主义者浴血奋斗追寻光明的精神图谱。

互动环节，有读者提问：为什么小说中更侧重写地下党人，而少了对当时上海其他社会势力的群像描写？对此，孙甘露的回应是，这关系到叙事视角的处理，“如果多个群体同时都写，显得作家是以‘全知视角’讲故事，反而容易削弱了故事张力，我的任务之



孙甘露（左一）与读者分享交流。
罗雅文摄

一是帮助读者维系悬念。”在他看来，小说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依据真实的历史，但服务于虚构。“讲故事的人当然知道情节的走向，但怎样在叙述中不变形，留住悬念，吸引读者走下去，这是写小说有趣的地方。”

在致敬革命历史文学传统的同时，孙甘露在写作中融入先锋文学叙事诗学，在小说结构、小说空间、人物塑造和情感世界的描摹上，引入更有现代意义的叙事技法，创造了独特的小说美学风格。

“讲故事有多种方式，先锋派小说家尤其关心怎么讲，但我发现你选择了用谍战类型来讲述，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面对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该书责任编辑之一李伟长抛出的话题，孙甘露援引作家纳博科夫的观点——“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件事比让小说家谈论自己更尴尬了”。他打了个比方，写小说有点像变戏法、玩魔术，“如果有读者到身后一探究竟，戏法可能就不好看了，祛魅了，丧失了很多乐趣。”孙甘露坚持，艺术

创作有逻辑清晰的一面，同时也有灵感随性的一面。

由《收获》长篇小说专号首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千里江山图》，自问世以来备受各方关注，小说以文学的方式想象和呈现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以文学的品格刷新了很多人对于红色题材书写的既有印象。“千里江山图又是名画，又是代号，究竟有什么寓意？”有读者好奇。孙甘露眼中的上海书展读者“修养高，见多识广，有很好的鉴赏力”，他认为小说借一幅传世名画形成了“叙事麦格芬”，沉稳达达地叙述着历史长夜里的生死较量、时代演进中的信仰对决，力求呈现出类似古典名画“千里江山图”般的空间诗学。

兼具明暗的交织、光和影的流动、静与动的呼应、快与慢的辩证，《千里江山图》纸书热销的同时，在融合出版、影视版权和版权推广中表现亮眼，陆续开发电子书、音视频产品等衍生品，同时策划“红色剧本杀”等破圈活动。同名广播剧已上线并亮相上海书展未来阅读区；同名电视剧此前公布了概念海报，目前正在选角中；更多舞台剧版本也在酝酿之中。

索南才让：用汉语写作“翻译”游牧文化

■本报记者 柳青

85后的索南才让是青海省第一位鲁迅文学奖得主，今年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期间，他在多个场合交流了从游牧生活进入写作世界的经验。他说，虽然现在他是生活在县城的小说家，但他的牧民身份无法割舍。12岁离开校园后的游牧生活塑造了他，也是因为牧羊人所忍受的极端孤独，让他到书籍和文学的世界里找到了精神依靠。西北荒原的游牧文化和西方翻译小说共同造就了今天的他，他在文化的碰撞中摸索写作之道。他的汉语写作，很多时候是对蒙古和游牧文化的“翻译”。

索南才让出生在青海湖边，他所属的那支蒙古族被称为“德都蒙古”，意思是青藏高原上的蒙古部落。他家祖辈都是牧民，维持着季节迁徙的游牧生活。这使得他的就学极为困难，他四年级以前，他为了上学，寄宿在三个亲戚家，即便如此，仍然转了三次学。四年级时，他和家里商量回家放牧，父亲特别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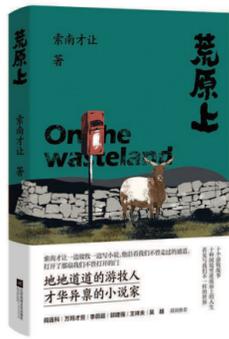
兴，为了提前过上退休生活，不但同意他放弃学业，还一夜之间把家里的马群、牛群和羊群交给了12岁的他。索南才让在还是少年的年纪，猝不及防地开始了全职牧民的生活。他后来写短篇小说《我是一个牧羊人》，就取自他的真实生活经历。

索南才让回忆起来，从没有为很早离开学校而后悔，他至今认为，回到草原上，是挣脱了束缚，回归大自然，体会“天高任鸟飞”的快活。但是自由的代价是孤独。牧民每年至少有半年的时间在游牧中度过，跟着季节，跟着水草，游走在广袤的高原上。从天亮到天黑，天地之间除了牛羊，就只有才让一身的牧羊人自己，这种孤独对于十几岁的少年来说是极为痛苦的。他在孤独中找到了书本，找到阅读，从阅读中开始真正的学习。他说：“我的人生学习阶段，是从离开学校之后开始的。”起初是武侠小说，后来是草原民族的昆仑神话，又扩展到《荷马史诗》和《红楼梦》，他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感知到成长阶段里时时刻刻流逝着的时间，文字构筑的世界，作家们用想象建立的世界、文学的世界，填充了他在草原上仿佛无边无际的时间。直到今天，他仍然认为，阅读让他进入了一个可以超越国籍和性别的世界，“书是全人类共通的、没有区别和等级的一种语言，文

学是人类精神层面的通行证。”

索南才让从他的阅读经验和放牧的生命体验中感受到，不同的民族拥有各自的语言，有自己生存方式和历史，这些不同的声音、语言和历史经验形成的文化，一方面传承着一些宝贵的、属于自己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在形成一种漩涡，不断和外界进行着多元碰撞和交流。比如他，生活在青藏高原，是个游牧的蒙古族，母语是蒙语，生活中使用的是地区方言，而在更广泛的生活中，他使用汉语，也用汉语写作。“我在写作中，很多时候是在进行一种很奇妙的翻译，是把我构想出的、召唤来的那些人物讲的蒙古语，以及那些方言，通过我翻译成汉语。在这过程中，我体会到了不同语言的内涵和韵律，以及它们带来的叙事活力和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形成了我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里面有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有中国几千年汉语的精气神采，有来自全世界的被汉语翻译过的文学经典带给我的丰富的叙事资源。”

当他开始以写作为职业，有一年，索南才让不再跟着牛群、羊群去夏季的牧场。他停留在春天的住所，那是一片广袤无垠草原上的一座孤零零的小房子，陪伴他的只有几匹马。其中一匹临近分娩的母马难产了，索南才让和那匹马共



索南才让《荒原上》书影。
(出版社供图)

同度过了一个无比艰难的夜晚。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来了，挺过难关的母马带着新生的马驹走向草原深处，他看着它们离开，那一刻他感知到如基因般植在他的生命和写作中的东西，那就是生命的向上力。即便他把牛羊交给弟弟，即便这两年他住在县城的楼房里，每天读书、写作、喝咖啡，但他知道，自己作品中存在着一些不可替代的精神气，它们在草原上，在那片人与人之间动辄相隔50公里的原野上，那是一股天地之间疯长的生命之力。

■本报记者 柳青

近日，昆德拉最新译作《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发布暨读书会上，学者毛尖快人快语，她自称是“昆德拉的反对派”，认为昆德拉是一个杰出的、也是被限制的作家，他在写作中控制不住的炫技终究绊住了他，并且，他的文本也太“甜”了。

毛尖从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展开对昆德拉的解读，她注意到“昆德拉的法语是有口音的，不标准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标准的法语”成就了昆德拉，构成了他写作中核心的东西。昆德拉的小说和欧洲古典音乐有共通的气质，会有平行的第一主题和第二主题，有复调的结构，他会说这个世界是由刽子手和诗人一起掌管。在他所有的描述中，上帝也好，美也好，诗人也好，刽子手也好，都是似是而非的，都是不标准的形象，就像他的法语一样，都是不标准的。

《生活在别处》有一个情节，雅罗米尔爱上一个女孩，他的占有欲非常强。有一次他和女孩约会，那个女孩没去，他一直质问对方为什么没有来。女孩说“我去看哥哥了”，她想用这个理由让诗人平复，但诗人非常愤怒，质问她：“你哥哥比我更重要吗？”女孩被逼得没办法，就谎称哥哥偷渡了。结果诗人把他的女友和她的哥哥告发，造成他们身陷牢狱多年。可以看到在米兰·昆德拉的笔下，诗人是不标准的，爱情也是不标准的，爱情终是谎言，诗人和刽子手的交集也是混乱的。

“通过昆德拉的小说，以前被所有的小说家描写过的诗人、阳光和美都变得不标准了，我觉得这个不标准成就了昆德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昆德拉的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就变得特别地广泛。当时的中国年轻人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是可以被这么书写的，爱情可以这么书写，欲望可以这么被书写。”

毛尖和译者董强都认为，《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虽然只是两篇长文组成的一本小册子，但从中可以看到昆德拉的思考是很复杂的。昆德拉的文本中，他致力于反对的不仅仅是用武力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特定大国，他反对了方方面面。昆德拉在“质疑一切，反对一切”的写作中显示出前瞻性：“在这片小国组成的区域，欧洲的脆弱性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加明显，更早被发现。”不久以后，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有成为小国的危险，并将遭遇小国的命运。“他对‘小国’的定义，不是地理意义的小，而是文化被吞并以后的‘小’。这个概念非常具有前瞻性，‘所有的欧洲沦为小国的命运’，他在1980年代初的观察，进入21世纪后，成为被发酵的题材。”

毛尖肯定了昆德拉作品的独特辨识度和前瞻性，她的欣赏不妨碍她仍然坐到“反对派”的一方，她认为昆德拉的局限同样是明显的。昆德拉对电影改编的抵触众所周知，当年他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改编成电影《布拉格之恋》，他极为不满，从此公然声明立下遗嘱，他的任何作品不许被改编成影视。昆德拉是个敏锐的艺术家，他看清了电影改编放大了他小说中隐藏很深的问题，所以釜底抽薪地杜绝了电影改编。因为电影《布拉格之恋》的气质是很“甜”，它太“甜”了。电影让昆德拉不得不面对他文本中的问题，他还是写得太过甜了。比较他同时期的作家或者导演，他自己欣赏的电影《维菊》、小说《好兵帅克》，以及卡夫卡作品，它们都不像他的小说那么甜。“为什么他会电影那么暴怒？电影拍得非常好，但电影的形式注定了它比昆德拉的小说还要甜。昆德拉当然意识到这个甜味的源头在他的小说，那他肯定要拒绝电影。他是有警惕心的，明白作品一旦过于取悦大众，对创作者来说是危险的。”毛尖说，她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对昆德拉越来越多的质疑，正是基于此。

更进一步，昆德拉身上有着一个才华横溢作者的局限性。“比如我们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很能感受到他控制不住的炫技，他把托马斯设定成第一小提琴手，特瑞莎是第二小提琴手，萨宾娜是中提琴手，另外一个萨宾娜的情人，设置成大提琴手。这些人物的设定对应他们在乐队里的职能，对应着音乐里的地位，最后这些人物的命运都按照他的音乐的设定往前走了。在文本的发散过程中，出现了他的遵循着古典程式化的太标准性，这个标准性限制了他的不标准。”即便是这样，毛尖仍然花了两个晚上精读了《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这本在昆德拉去世后面世的新作，因为“读这本书，可以重新体验昆德拉文本中的意义，能理解他所宣扬的‘轻’所对应的‘重’，两者不是对立反义的，轻和重是辩证，像刽子手和诗人之间的辩证。某种意义上说，读这本书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昆德拉”。

毛尖谈昆德拉：他还是太『甜』了

